

兵败如山倒

——房山城解放记忆

王凤梧

六十一岁的人，我掐指算来，已是四朝遗老了。生于民国十六年，那年炮打涿州。十一岁（虚）卢沟桥炮响，中央军一退，便早早地当了亡国奴。1945年（民国三十四年），日本无条件投降，又迎来了退走八年的国民党，算是“光复”之民。民国三十七年（1948年）冬，炮轰房山城，终于解放。出生后的二十年，枪声断续，炮火明灭……

中央军和老百姓一块往南逃，就听大人们感叹：兵败如山倒。我提着鞋过河，问：“兵败怎么就山倒，不如人倒、墙倒、房倒呢？”姐姐推我：“快走！不走，你也倒了……”

十年后，我也成了“如山倒”的“败兵”中的一个兵犍子，那次是1948年底房山县城解放。

兵败如山倒，我起码有三次应该写入我个人的《王凤梧大事记》。一次是随大日本皇军、保安队、警察局被八路军从河北省献县城内赶出来……如果有一天要写，题目应该是《随皇军败走献县城》。第三次则有点象征了，那应该是《傻鸣，傻放，一败涂地》。闲话少说，书归正传……

天气已冷，已穿上了老百姓赐名“老虎皮”的黄色棉军装。不知别人如何，我总一阵阵瑟瑟发抖。大概是隐隐炮声震的。先是大安山、红煤场的保安队偃旗息鼓、鸡不叫狗不咬地撤回房山城，跟着是坨里、长沟的各路诸侯也班师回朝。被称为“老佛爷”的保安队总队长张德祥，胸无点墨，一脸黄肉带着三分气，这回气更大、肉更横，骂人更多……

总部设在县城北街中间路东。门口一个砖砌抹青灰的矮堡，供岗哨夜间避寒或作战之用。并不象电影里高墙大堡，但也给人森严之感。

这些日子，当兵的和老百姓都像热锅上的蚂蚁，来去匆匆，乱乱轰轰……

我待的是保安第一大队第三中队。大队长叫尤茂志，小个子，镶金牙，挺精神……大队长长住坨里，现在已撤回房山城。三中队队长叫赵立亭，黑红脸，大个子，半文盲。三中队原驻北门里路西一个大院（现在的大众饭店一带）。大队部一回来，三中队被挤出北门，驻在北关安善家和王家店的路东大门院里，防线是城北一面。

前二年为巩固城防工事，在围房山城一周挖了护城河。引东、西沙河入护城河，水深没人，河宽不可跃过。四门各设吊桥一座，白天放下供人过往，晚上拉起，内外隔绝。城上的敌楼、墩台都有班、排驻守。为防八路夜间攻城、爬城，又准备许多铅丝、棉花、煤油——一旦有事便以棉花团蘸油点燃系之铅丝，以作照明之用。

那时候，我一直是“上士文书”。我的文件只有一本《花名册》。官兵108名，军衔、职务、姓名、年龄、籍贯、枪支名称、枪支号码都在册子上。换枪、换人我就另行注册。我的字写得不管好坏，但必须一丝不苟；不然，中队长点名时不认识；他就要发脾气。我这“上士”上比官小，下比兵大。官儿称我“先生”，兵也称我“先生”，其实是个“自由兵”。

那时候没什么“觉悟”，连这个词儿也没听过。我老家饶乐府离城二里。秋粮收下来不等脱粒，保安队就大队人马车辆把带“瓢”的玉米拉进城……老乡亲哭喊、追赶、咒骂我能看得听得清楚明白……这时候就有了盼“八路”早来的愿望——要说热爱共产党还确没达到那个高度。

房山城东北二里的齐家坡，西南一里的小山坡，正西二里的山顶庙和西北角附近的西北关，都驻有数量不同的保安队——大概即兵家所谓“犄角之势”。

八路军攻打房山城是从“犄角”开始，同时并举。趴在城墙垛口上几乎能看到攻方每颗炮弹炸落岗楼的砖、坯横飞……张德祥的重武器只有两门“八二”迫击炮。只听炮兵忽跑向东，又跑向西，大概是从城内给以火力支援。但是可以判断：此时已处于顾此失彼、乱了阵脚的形势。

作为文书、庶务等中队勤杂人员都既手无寸铁，也从未经过战事。我和宋芝（庶务）、吕士超（文书助理）等人没有防守任务——这时，三中队已从北门外撤回，负责东城防守。中队指挥部就设在东城敌楼中。

房山城为外石内土。为死守，早已掏土成洞，开射击孔……此时保安队的武装力量全被赶上城，中队长便叫我们躲在“洞”中待命……

事先，我已将棉便衣套入军装，行李寄放民家，身边带的只有一只图囊装着一本《花名册》，囊带上左系几双旧鞋，右系一搪瓷缸。最重最贵的是“美国救济总署”发给的一条劣质毛毯——我不懂“轻装上阵”，我只望随时“轻身”逃跑……

不到半夜(那时连中队长也没表)时，一阵脚步响到了洞口，有人叫：“马上撤，去北门大队部集合！”我们几个爬起就跑，根本也没见着中队长和别的人……那时从东门斜向北门是一片空地(大概是今天的、粮食局、北大寺之间)，距离不到一里，我的外束皮带已经跑丢了。我们跑到北门里大队部门前，已不成队伍。此时，尤茂志指指划划、骂骂咧咧。我听他喊：“剪刀预备好了吗？”大队部文书韩宇文马上举起一把剪刀：“预备好了。”尤茂志说：“马上剪断电话线！”

一出北门已不成队形。吊桥虽已放下，可是踏板不全、横三竖四。人们逃命要紧，挤挤撞撞、嗔怨低骂，也有的掉下桥在河里呼救……一过吊桥就象决堤之水，齐头向羊头岗的方向流去……

原齐家坡的据点只有散落枪声，估计已被“八路”夺取，这就使溃退的保安队望而生畏。我的一位本家哥哥王全信是某中队的伙夫，他拉我一把：“咱们回家罢？！”饶乐府只离我们脚下一里多地，但中间就是齐家坡的岗楼。我说：“别价，要叫人家给一枪呢？！”于是随大队又跑……

什么叫“风声鹤唳，草木皆兵”，这次我有了亲身体会。一枪未鸣，前面的人忽地卷回了头，后面的掉头就往回跑……大家跑一段听听，似乎明白了是自己吓自己，于是又返回头再向东北跑——目标是北平。

过了羊头岗村南就是大石河。大石河明流、潜流相间，我不记得涉水。这时，官兵已是相见而不相识……

今天回忆，那次败走房山，队伍虽乱，但全都默默无语——大概是官兵都只顾逃命，怕一谈话被人家发现——其实真也无话可谈。

天明，眼前一道不宽的河。这时有人说：“哑叭河，离长辛店不远了……”我回头看见，“八二”炮还被炮兵扛着，已没了炮盘；重机枪也没扔掉，可已没了脚架……光头的，光脚的，哭的笑的，开玩笑骂人的……身后，已远离“八路”，东方，已近望北平。听传说，房山保安队要进北平——一点生机，大概来自这点希望。

到了长辛店西的王佐，我已寸步难行。中队长不知身归何处。一位叫段玉恒的排长和我和几个兵自然结合成一伙，段排长已成为最高指挥。他指派二人去放哨，随时报告情况……我们进了一户农家，没见主人，桌上有白酒(也许是段排长自己带的，他好喝酒)，锅里有还热的蒸白薯：土炕挺热，我们便喝酒暂息。不一会儿，岗哨报告说，八路已从西面追来……我希望不是八路，最好是保安队，那样我能多歇歇腿。岗哨咬定是八路，我们只好再走……庶务宋芝是附近村庄人。领我去投一家他的亲戚。人家已去北平，只有一个看门老人。此时我已不怕八路追上，便舀热水洗脚、换鞋——其实我已胸有成竹。

再回到“喝酒”的人家，段排长正找宋芝和我，准备撤退……我对段排长说：“你们跑罢，我跑不动，回家了！”他一愣：“你这身‘皮’，叫他们逮住就没命了！”我解开军装扣子，叫他看，“我有便衣！”我把装了《花名册》的图囊、搪瓷缸全给了他，只留下了那几双旧鞋……正好来了这村的保长。段排长说：“保长，照顾他点儿！”保长和我一对脸，原来是在天津学徒时的相识——他叫王殿荣。他说：“这不是风梧吗？快脱，跟我走！”我脱下那身“老虎皮”塞进灶洞……后来才发觉，连几十元“金元券”和一支钢笔也葬身灶洞了。

王殿荣相当经理或副经理的角色，在煤栈我只是学徒。他仍不失旧谊，以长兄之情安慰我，招待我。吃了他家一顿精致的小米饭、豆面汤……他一定留我，等局势安定再回家……

我自度：我只是个孩子。虽当了二年多“伪军”，我毫无民愤。乡亲们出城进城不方便，我常用“公章”给他们开证明……

西望房山已见家——我不必愧见江东父老。

饶乐府村公所正有工作人员为顽伪人员登记。我登记后，那工作人员相视之后，原来也算熟人：1945年他主持后朱各庄村选“国大代表”，我作为这村的教师，为他写标语，当司仪……有一面之识。他说：“你当过教员，就还在本村当教员罢！”于是，我第二天就当了饶乐府小学的教师——北平尚未解放。

往事如烟，倏已四十年过去。时间、地点虽依稀可忆，但应有的历史的翔实，就不足了。不过，经历和体会却真实，因为我总是兵败如山倒中的一个成员。

(《房山文史资料》第2辑)